

# The Syntextuality of the Hypothesis of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Kai Wang, Hengjin C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mail: owenwangk@gmail.com, hydra6@gmail.com

Received: Apr. 1<sup>st</sup>, 2013; revised: Apr. 16<sup>th</sup>, 2013; accepted: Apr. 22<sup>nd</sup>, 2013

Copyright © 2013 Kai Wang, Hengjin Cai.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are presented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ies. The Keynesia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ignores individual economic demand on self-affirmation, leading to the failure in efficiency and justice in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Austrian School, on the basis of subjective methodology, emphasizes the rationality of self-satisfaction under exchange activities, does not provide any instruments on wealth redistribution.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describe the demands originated from human cognitive tendency to confirm self-values. It is a dynamic process originated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stimate of outside world. The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derived theories have offered explanations of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and proposed an efficient monetary instrument to realize wealth redistribu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could bring about a new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ies.

**Keywords:**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Syntextuality; Rational Man; Austrian School

## 自我肯定需求假设的认知综合性

汪 恺, 蔡恒进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 武汉  
Email: owenwangk@gmail.com, hydra6@gmail.com

收稿日期: 2013年4月1日; 修回日期: 2013年4月16日; 录用日期: 2013年4月22日

**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经济学发展史, 指出经济理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认知局限性。基于“理性人”假设建立起的凯恩斯主义供需模型和国家干预机制未能重视经济个体源于肯定自我的正当需求, 使国家干预在财富调控中效率低下; 基于主观方法论的奥地利学派强调了人在交换理论框架下获得自我满足感的合理性, 但基于先验论的奥地利学派未能给出指导财富分配的工具。自我肯定需求, 来自主观的判断, 并形成于认知范围内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动态比较之中。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 阐释了财富的涌现与流转规律, 建议构造财富再分配的高效信息工具, 将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关键词:** 自我肯定需求; 认知综合性; 理性人假设; 奥地利学派

### 1. 引言

2012年8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名

为 *Two Prisms for Looking at China's Problems* 的署名文章, 作者 Tyler Cowen 综合梳理和阐述了当今两大

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对中国经济走势的争议性看法。

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对近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均做出了判断，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经历一个下行的阶段，但紧接着针对更长经济周期的判断却不同。凯恩斯学派认为，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构成的总需求，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遭遇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增长放缓时，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对经济进行调控。凯恩斯学派认为中国政府有很多辅助刺激政策工具，比如调整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指导国有银行维持贷款规模以及有效利用外汇储备，并通过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以实现经济软着陆，有能力使经济逐步走向复苏。

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相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走势却有着相对悲观的观点，他们强调由政府干预的经济刺激政策会使得情况变得更糟，认为中国将国民收入的40%以上用于投资，数额庞大的刺激政策看起来壮观，但政府很难对巨额投资做出真正明智而高效的决策。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认为中国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来支持本国制造业的行为确实存在，而因为中国严格且偏向具有国有成分背景的股份制银行的信贷体制，使政府能够将巨额国民储蓄和民间资本更多地吸纳到国内大型银行系统并向政府扶持的国有企业商业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奥地利学派观点认为这些政府行为都使经济向特定的某种方向而非向改善宏观经济状况的高效方向发展。奥地利学派进而则认为，中国很难弥补其过度支持的投资活动。首先，这些投资活动虽然事实上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和税收，但随着商业周期的演进，新的边际投资价值逐渐降低，而且越来越容易被腐败所侵蚀。这样一来，早期的繁荣渐渐消失，同时并不是每个决策都是明智的，这些连锁反应很可能导致经济局部或逐步崩溃，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总需求严重不足，而是因为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不符合社会的真正需求。

凯恩斯主义在近一个世纪里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而一次次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事实却更加印证了奥地利学派的预言和推理。在奥地利学派的判断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那就是政府刺激政策带来的低效率突出反映在产出的产品和服务并不

符合社会真正需求。那么，为什么经济社会的需求如此难以满足，又到底什么需求是推动经济活跃、财富增长的根本需求<sup>[1]</sup>？经济学理论中是否需要一种新的需求理论来充实或颠覆现有主流理论体系、来解释近一个世纪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根源以及对财富分配、产能过剩、货币制度等重要现实经济问题提供问题解决策略？

经济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深远而又直接的。近一个世纪以来，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已经深刻的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人开始反思西方经济体制，将问题归结于自由市场失灵，甚至认为市场过分自由是错误发展倾向，认为自由化导致了金融和社会动荡的所有结果。也有人认为，危机之所以爆发，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才是真正元凶，秉承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透支未来、制定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实践行为如果往前追溯，也许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假设和具有瑕疵的均衡演算。

从上个世纪中叶到今天的各种经济理论以及其指导的经济政策，都无法绕开同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干系。更有经济学家认为近一个世纪频发的经济危机甚至可能正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然而埋葬了以理性人假设、商品需求缩减是经济衰退主要原因的需求匮乏理论论断为基础，以供需均衡、最大化计算的数学模型为理论指导工具的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要想扛起指导和复兴可持续的人类经济增长、避免经济危机周期性往复的理论大旗，米塞斯的先验论和拒绝模式化计算的鲜明倾向又使其缺乏指导实践的工具。

经济学在今天急需一种新的需求理论，来将所谓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础真正联系和统一起来，来阐释社会财富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原动力，来提供财富分配的有效理论和实践途径。这个理论假设应该不同于凯恩斯的理性人假设下的静态均衡和最大化模型，它应该更贴近社会个体差异而又统一性的动态需求演绎下的宏观演化；它也应该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绝对先验思想，因为它必须能够使用新的工具来演绎和高效控制财富和资本流动。

如果从经济学发展的认知视角和人的行为通论出发，对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假设“理性人”进行剖析，

反思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可能错误或不完善假设，我们就能一定程度上找到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方法论的选择和理论论证工具上的局限和障碍。如果我们从“自我肯定需求”这个新的假设视角出发，来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历史和当今社会所发生的财富分配和转移机制、经济危机、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率、货币制度等从宏观到微观具体问题，我们将会发现人的认知和反馈对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意义，发现自我肯定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和财富转移和分配根本动力的重要地位，发现由自我肯定需求衍生出的理论在指导重构经济世界和财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sup>[2]</sup>这个概念将只是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一个开端，由此衍生的理论将在重构经济学框架中起到重要作用，或许这将成为未来资源配置、民主金融秩序的新法则。自我肯定需求理论，是在解释了中国近两千年和西方近 500 年财富转移规律后，并剖析了古典和现代经济学理论所面临的资源配置认知局限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这种认知的综合性使其具有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 2. 认知局限下的经济学

如果我们从解释财富资本流动规律和配置资源手段的理论依据这两个主要方面来看过去近 5 个世纪经济思想的发展和问题，我们将会发现，经济学说的发展实际上只是人类认知进化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发展，既受到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左右，更受到人类所能掌握的认知工具的极大局限。

亚当·斯密虽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地位不可动摇，但经济学思想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酝酿和发展。早期的经济学思想更多为具有一定家庭资本积累的农场主小资本家服务用以管理和积累家族财富。接下来，从家庭到集体，在古罗马和希腊哲学家那里，经济学思想和技术开始逐渐为一个共同体——城邦服务，而不再局限于一个孤立的家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后者在所著的《政治》中都对交换价值、劳动分工、利息，甚至货币、税收、财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而直到 17、18 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那里才真正开始形成经济学思想体系，为一个

国家和民族思考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最佳法则，以苏格兰历史学派所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真正起点。

从小家庭积累财富，发展到使城邦繁荣，再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构建的古典经济学，探讨国家层面政治体制与经济繁荣的关系，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思想的早期发展，是从个体向群体向城邦最后到国家不断扩大研究对象范畴的财富研究过程。经济学沿革到今天，仍然更多的基于国家层面的财富分析和调控。从英国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的考察与研究到今天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刺激调控，经济学期长期存在着一个向上聚拢的资本配置权集中设想。国家层面的财富调控却始终没有一个与经济个体直接对话的理论途径和现实渠道。

这个不断扩张的认知范畴的发展，受到经济学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因素的诱导。一是由于新兴社会阶层诞生导致的财富重新分配，二是较小范畴层面的群体研究不足以为经济学家构建合理而具有说服力的系统学说提供足够的论证来源。在亚当·斯密之前，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在欧洲得到充分发展，新兴阶层涌现，这样的社会发展变革，为英国古典经济思想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一方面，重商主义的极度发展和成功，既让英国经济学家看到为财富积累和分配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学说视角的可能，又刺激了他们从国家层面使用理论工具进一步实现社会财富繁荣和分配的决心。而重商社会较于重农社会的极大不同，重要的一点便是其财富增长不断膨胀依赖于贸易自由带来的国家财富积累与资金外流的管制。从这里开始，经济学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回头的路，那就是基于国家层面的财富增长和分配思路。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由经济学思想带来的世界动荡与变革充斥了近两个世纪。当今关于经济学说的所有争论，根本基于一点——“国家干预的效率”。从亚当·斯密到今天，经济学说基于国家层面的调控从未动摇，这其中不能绕开方法论的问题。从亚当·斯密，再到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坚信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相信社会财富分配可以通过完美的演绎和计算揭示其规律，坚信国家机器对于财富分配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性和重要作用，坚信需求是可以被国家层面调控

满足的。前者过分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的集体利益而运行的，个人的私人利益、个人的自主经济行为等，都是取决于国家的；后者将个人的需求模式化，通过市场加国家调控的完美公式演算实现社会财富繁荣和经济增长。

我们再追溯到经济学发展早期，古典经济学与希腊经济思想的最大不同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对象成为经济学观察、研究和进行实验、提取经验的对象。最重要的是，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找到了所谓“社会财富增长的内在机制”，认定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与贸易是实现财富增长、经济繁荣、国家兴旺的科学规律和黄金法则，确立了自由市场下的理性人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强调了个人主义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满足的同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良性贡献。

然而事实上，经济学接下来的发展，一方面基于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追求私利和幸福感的假设，另一方面却逐步背离了基于重视个人需求的轨道。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一方面声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基于个人私利需求的假设，而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调控虽然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建立起来，但集中的财富分配和调控权却失去了和个体经济人的真正对话，而马克思则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突破口，揭露了所谓资本主义的罪恶，从国家干预和控制层面全面接管资源配置，认为在国家层面进行的对于个人利益和保障具有最大的公平效率。近两个世纪，在经济学理论指导现实世界发展的历史上，个人的真正需求从来没有话语权，个人的需求从来没有作为真正的财富分配主体和出发点来进行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形态，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掌握了均衡与最大化的数学演绎工具，并进行了精密和让人信服的推理计算，并让人们看到使用经济理论及其工具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极大可行性。古典经济学中的伟大哲学家休谟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重视个人的真正需求和基于自由交换理论的学说无法指导实践根本上在于缺乏工具。休谟和米塞斯均着重强调了国家作用的局限性，主张限制国家干预，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繁荣不能实现公民的真

正需求和自由，提出了国家机器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能“联系”到每个公民。前者更多在基于道德层面的哲学研究中进行了文本的阐述，而后者基于先验论的阐述对经济危机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准确的预测并对具体问题进行了逻辑的分析和推理，但二者始终没有像凯恩斯或者马克思那样对现实经济给出数量化的系统分析。近几个世纪，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在现实世界，都缺乏一种工具，来限制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作用、来实现公民的真正需求，直到今天网络世界和网络工具的出现。而作为理解和控制的所谓各类金融工具，也越来越多的面临一个问题——同样的工具基于不同的财富分配立场将具有不同的效用。同样是作为工具的货币，当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大额超发时，财富流转结果却会迥异。在民间资本和个人容易获得信贷资格并能够大幅借贷的国家，货币的稀释也将一定程度有利于民间资本和个体债务持有者；但对于资本集中于国家资本层面的国家，货币的大额超发带来的通胀和滞胀，结果只会稀释民间资本，使资本进一步向上层聚拢，底层社会承受货币大额超发的最大负担。所以，经济和金融研究工具应该处于满足自我肯定需求、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sup>[3]</sup>等财富流转和分配立场的下一层，而非仅仅停留于实现所谓均衡的数字逻辑层面。基于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信息化金融世界，将会史无前例的为经济学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这正是经济学基于人类认知世界角度新的突破。

### 3. 奥地利学派以及“理性人”假设的困难

诞生于 19 世纪的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史上和任何学派都风格迥异的一支，作为非主流的经济学派，一个被东西方各国政权摒弃的经济理论，却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一方面原于其对美国大萧条必然发生和高度集权下计划经济必然失败的两次准确预判，另一方面在于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唯一反对“看得见的手”的学派。

经济学范畴的人的行为通论本质、主观价值论以及对于经济行为繁杂过程而非数理均衡逻辑演绎的重视，成为其醒目的标志。奥地利学派强调的不是完美的计算，不是均衡的博弈，甚至有众多理论研究对其主张过度的市场灵活性和过于强调经济心理的研

究取向提出质疑。但与进化论结合的奥地利学派，就是这样一种将焦点聚集在动态和人的行为<sup>[4]</sup>，强调先验的论断。也既然是和先验论和进化论紧密联系，它就不再追求 GDP 静态均衡性，也不必要追求过于精确的先验预期。但即使是奥地利学派内部，也出现过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工具上分歧<sup>[5]</sup>。门格尔和他的维塞尔，熊彼德等，曾经将奥地利学派向“主流均衡”靠拢。但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的主旨做出了最完整和系统的论述。

米塞斯强调人的经济行为必须拉到交换学的框架中，强调将价值判断的权力交还给每一个人。“交换学的主题是一切市场现象，包括它们的一切根源、一切分歧和一切后果。在市场买卖的人中间，不只是想取得衣食住和性的享乐，而且也有多样‘理想’的动机，这是个事实。行为人总是既关心‘物质’的东西，也关心‘理想’的东西。”“行为的原动力，不是别的，是想消除不适之感。”“行为人一定具有某种目的和有意识的行动<sup>[6]</sup>。”米塞斯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对外部物质和社会世界具有感觉、理解和知识，并用来指导和塑造行为。作为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匮乏和认知能力的限制，都是在他主观认知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的感受、知识和计划因素，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进而无法对人的经济行为作出真正合理和分析与理解，更无法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效用最大化的决定论提出坚决的质疑，认为它没有为真正的主观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后者的假设与推论中，行为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选择。人权，在奥地利学派之中，不是一个“哲学”或者“伦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主观价值论是奥地利学派最突出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它们研究人类行为总的途径。哈耶克甚至曾经说道：“在过去的 100 年，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是在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上取得的<sup>[7]</sup>。”

然而，同经济理论任何时期的发展一样，奥地利学派同样受到认知范畴的局限。奥地利学派强调了个体作为经济主体的主权，强调了国家机器在财富再分配中难以做到公平和高效的特点，但却无法提供一种非静态非数理推论的理论工具来完善理论、改造世

界，使个人利益在经济世界中得到充分重视、使个人与国家在经济动态中紧密地联系起来。奥地利学派具有进化论思想的理论背景也使其在诞生初期以及西方主流思想界发展中蹑手蹑脚。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源并没有被奥地利学派更根源性的阐述，而基于信息缺乏和认知演化的需求理论也没有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得到更深的挖掘。这其中重要原因，其一在于对象化手段，则以系统工程的方式，基于进化理论的计算机模拟系统在奥地利学派诞生的时代无从谈起，其二在于将个人主观价值取向与国家层面财富分配调控联系起来的信息系统在米塞斯那里无法想象。而这两点，正是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工具。

西方经济学，在奥地利学派以外，从边沁将把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精神说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途径以来，从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穆勒以来，一直到凯恩斯，均把所谓单纯的不思考利他的“理性人”，即“自私私人”，来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但这一个世纪越来越多的由此假设推演出的经济学理论和进而指导的经济政策的失误和经济危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这样的假设是否具有说服力。无论是休谟对于单纯自我私利的质疑，还是米塞斯对于自我满足对于经济活动波动的再定义，都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对理性人的假设进行重塑。

#### 4. 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必须有一种新的“经济人”假说来取代原有的“自私私人”的假说，以及一种更根源性的需求来解释个体经济行为的成因。蔡恒进在总结了东西方 2000 多年的财富流转历史和规律的基础上，全新而又逻辑缜密地提出了经济社会财富增长的源动力和财富分配的准则——“自我肯定需求”。实际上，“自我肯定需求”，是能够将“非自私的理性人”与“主观价值论”完美结合与统一的阐释。即每个人经济行为的根源性需求都是“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

在自我肯定需求的假设中，我们第一次能够看到

一种更理性和贴近于人的真实认知世界的全新假设。在自我肯定的假设中，人的需求从属于人的认知范畴，这个范畴又将人与环境在交换和评价的框架中建立起一种动态效应。这样的认知特征，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认知进化优势，使人在改造世界和经济社会中具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但自我肯定需求并不从属于心理学、行为金融学或者微观经济学中的解释范畴，而是一个更本质的概念和综合的纽带。

在现今中国，对于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背后出现的浪费问题，是可以满足创造出的“需求”，却无法或低效率地满足“自我肯定需求”来解释的。而自我肯定需求被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能用凯恩斯的均衡和最大化模型来计算，它是一个基于个人信息习得、反馈、改造的混沌系统，而它又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个人主观方法论，因为奥地利学派基于行为的先验主义无法对现实进行实践指导，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对现实世界财富流动与分配进行有效的改造。而这个混沌系统理论假设是“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基础将会是基于进化的计算机动态模拟，实践基础正是蔡恒进在 2009 年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探索》<sup>[3]</sup>思想时的设想——实现中央银行与个人对接的个人金融账户网络。这样的账户系统，将不仅为政府跨越逐级拨款、资金层层克扣提供真正解决途径，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将第一次实现和每

一个社会经济个体直接对话的可能。这个系统不仅将为每个公民带来政府的直接注资，它将为政府提供包含海量信息的个人金融动态数据库，为政府对货币弹性、产能过剩状况等提供策略信息，为个人提供基于新保险制度下的金融民主。从这个系统运行开始，一切金融手段将被重塑，货币政策将具有新的参考依据和调控手段，政府财政政策的效率和效用将具有新的度量评估工具，个人将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家层面的财富分配和流转控制中来，财富的增长再也不仅仅是国家或者少数人层面的利益分配，而是全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机会。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H. J. Cai, Y. P. Wu.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are the ultimate cause of financial crise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2011: 445-449.
- [2] H. J. Cai.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ntry poi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2012, 2(1): 1-6.
- [3] 蔡恒进. 构建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探索[N]. 中国改革报, 2009年2月2日, 第5版.
- [4] A. Oakley. *The revival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1999.
- [5] P. J. Boettke.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London: JAI Press Inc., 1998.
- [6] 米塞斯. 人的行为[M]. 夏道平译. 台湾远流出版社, 1997.
- [7] 哈耶克. 哈耶克论文集[M]. 邓正来选编/译. 北京: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1.